

# 从墓葬壁画看辽代契丹仪仗

吴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辽代契丹人墓葬壁画中的出行仪仗图是引人瞩目的, 通过对仪仗中各种基本用具的分析, 可以看出契丹人汉化的现象以及辽代和中原王朝的交往关系。在辽代中后期以后这套仪仗在契丹高等级墓葬壁画中频繁出现, 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墓主人身前的地位相联系。

**关键词:** 辽代契丹墓 墓葬壁画 契丹仪仗

**中图分类号:** K871.6 **文献标识码:** A

辽朝是由活动于中国北方的契丹族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至天祚帝被女真所灭共历二百余年。在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中, 出行仪仗图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探讨<sup>[1]</sup>。但是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多, 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 并结合其它相关材料, 对辽代契丹人墓葬所反映的契丹仪仗进行讨论, 不当之处请方家多多指正。

## 一、仪仗用具的分析

辽代契丹人墓葬壁画中的出行仪仗图包含了由专人负责管理的旗鼓、长剑、伞、骨朵、水罐、坐具以及出行时的车马和侍从。目前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中具备上述题材且基本为契丹人墓葬的有庆陵的东陵<sup>[2]</sup>, 库仑 M1、M2<sup>[3]</sup>、M6<sup>[4]</sup>、M7、M8<sup>[5]</sup>, 萧义墓<sup>[6]</sup>, 萧和墓<sup>[7]</sup>, 鸽子洞墓<sup>[8]</sup>, 床金沟 M5<sup>[9]</sup>, 滴水壶墓<sup>[10]</sup>和解放营子墓<sup>[11]</sup>。

### 1、旗和鼓

“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 是为国仗。其制甚简, 太宗伐唐、晋之前所用皆是物也”<sup>[12]</sup>, 契丹民族最初使用的仪仗应该就是文献所记的这套仪仗, “太宗克晋, 稍用汉仪”<sup>[13]</sup>, 辽太宗灭后晋之后契丹人才逐步形成自己的仪仗。文献记载辽代天子享有“十二神纛,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华盖, 直柄华盖”<sup>[14]</sup>。据林沅先生研究, 辽代王一级别的贵族可能使用六旗六鼓, 库仑 M1 墓主人使用五旗五鼓, 其级别也相当之高<sup>[15]</sup>。由此可知在辽代旗鼓的多少可能是主人身份高低的判断标准之一。

目前壁画所见的契丹仪仗用旗能辨别形制的只有解放营子墓, 为半圆形旗帜, 旗面有多种色彩且上下端加飘带(图一, 1)。另据报道,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征集到的一件辽代墓葬出土的木门上绘有“鹰”和“日月”图案的旗帜(图一, 2), 其形制和解放营子墓的旗帜相似, 研究者将其定为辽代军旗<sup>[16]</sup>, 此旗帜也应具有仪仗的意义。库仑 M6 出行图驼背上插有一杆小旗, 在旗面后有一条飘带, 此旗既无专人执掌, 也没有像库仑 M1 那样多杆一起捆扎, 可能并非仪仗用旗。其它诸墓所绘仪仗用旗或不能辨别其形态, 或已完全漫漶不清只剩旗杆。除了壁画材料, 旗鼓仪仗在传世画中也亦有所见。“文姬归汉”是汉代故事, 北宋以后以此题材创作的传世画颇多, 两宋之际李唐所作的册页画《文姬归汉图》就是其中之一<sup>[17]</sup>。画中有的人物为髡发, 其特征与目前所认识的契丹民族发式相似<sup>[18]</sup>, 画中的驼车也和辽墓

壁画中的驼车一模一样，因此该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契丹人的仪仗排场。画中第六、七、八、十页中绘有仪仗旗鼓，旗为五杆，旗杆中部捆绑而下端插于地上，与库仑 M1 和鸽子洞墓壁画中旗的摆放方式相似（图二，1—3）。此画中所绘的仪仗用旗是一种长方形单色旗，红、黄、黑、白、灰五旗面后有三条飘带（图一，3），此种颜色的组合可能有更深的含义。

以前发现的契丹墓壁画仪仗图中所绘的鼓都是大鼓，其高度和面阔都相当可观（图二，1，3）。2001—2003 年辽宁阜新关山种畜场马掌洼发现辽代家族墓地，2005 年初对该墓地的萧和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该墓墓道北壁仪仗图的中部绘五人骑马，且每人身后背着一面小鼓（图二，4），简报推测在此鼓队前的马队可能是旗队，并提出此种小鼓可能更加接近辽代旗鼓制度中鼓的外形原貌<sup>[19]</sup>，这无疑为辽代仪仗用鼓添加了新的内容。而李唐《文姬归汉图》的第六、七、八、十页中所绘的鼓也应属于辽代仪仗用鼓的一种，该鼓就挂靠在旗杆的下半部（图二，2）。画中出现的鼓是一种圆面的扁鼓，与契丹墓壁画中常见的大鼓以及萧和墓壁画上的小鼓均有差别。由此可知目前所见辽代仪仗用鼓可能存在三种形制：第一种为大鼓，如库仑 M1，鸽子洞墓以及萧义墓；第二种为扁鼓，如李唐《文姬归汉图》；第三种为小扁鼓，如萧和墓。

仪仗用鼓中不同规格的鼓可能有其不同的意义。萧义墓在墓道中绘五面大鼓，其墓主人官至北府宰相。鸽子洞辽墓墓道中残留有三面大鼓，据残存的墓志记载，墓主人为萧氏，官至“……忠正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权燕京……”<sup>[20]</sup>。库仑墓群被认为是“驸马都尉、殿前都点检、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sup>[21]</sup>萧孝忠的家族墓地，库仑 M1 墓道仪仗图中也绘有大鼓，虽然不能确定其墓主人的身份，但其墓道壁画的排场比萧义墓和鸽子洞墓更加铺张，因此其地位应不亚于前两者；库仑 M8 墓道仪仗图中也残留有一面大鼓，虽未发现完整的旗鼓，但是其墓室和墓道总长度达到 60 米，远远超过 M1，报告推测该墓主人可能就是萧孝忠<sup>[22]</sup>。“文姬归汉”故事所描绘的主人公是蔡文姬与匈奴左贤王，李唐所处的时代与匈奴相去甚久，因此他把《文姬归汉图》中的东汉匈奴人绘成北宋时期同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的形象。由此可知，契丹贵族中与匈奴左贤王级别类似的人物可能是使用画中所绘的扁鼓。据有关学者对萧和夫人墓志的考证<sup>[23]</sup>，萧和生前并没有担任高官，其卒年较早，他的爵位是他死后因其女儿贵为圣宗钦哀皇后而逐步得到的追封。因此笔者倾向于在萧和下葬时该墓并没有绘制墓道中庞大的仪仗图，而是在其夫人“启先王之莹”<sup>[24]</sup>与萧和合葬时才绘制的，此时该墓的主人已贵为晋国王和王妃，这才有资格使用旗鼓，使用的是小扁鼓。辽代绘旗鼓的墓葬所绘旗鼓代表了墓主人等级之高，它的数量可能体现更细的等级划分。鼓的大小可能也与高等级人物的身份有一定的联系，但就目前资料而言，具体何种身份人物对应何种规格的鼓尚难有规律可寻，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考证。

辽代仪仗用鼓最早应来自于唐代的赏赐，但具体赏赐的是何种形制的鼓目前仍不清楚。契丹墓葬壁画仪仗图所绘的大鼓和辽墓壁画散乐图中必有的大鼓<sup>[25]</sup>形态最为接近。“（后）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sup>[26]</sup>，由此可知辽代散乐由中原而来。唐代为拉拢契丹人、肯定其作战能力所赏赐鼓纛之鼓可能就是唐代散乐所用之大鼓，而击大鼓也能够显示出首领的威仪。萧和墓仪仗图中的小扁鼓和喇嘛沟辽墓壁画备猎图的小扁鼓<sup>[27]</sup>形态相似，彭善国先生认为后者可能是契丹人狩猎时所用的惊鹅鼓<sup>[28]</sup>。这可能是辽代仪仗用鼓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此种小扁鼓，究其原因可能是小扁鼓携带时的灵活程度远远优于大鼓，因此契丹贵族为了在狩猎活动中行动更便捷将此小扁鼓也作为仪仗之用，出行时用仪仗，到达狩猎地时便用作惊鹅。

## 2、其它用具

伞、骨朵、杖、坐具、水罐、剑等用具在契丹墓葬仪仗中出现频率是较高的（见表一）。

综观这些仪仗内容虽然反映出墓主人铺张的一面,但是这些用具基本都是这些身份突出的墓主人出行时可能用到的器具。下面就针对这些用具提出一些认识:

1、骨朵和杖。辽墓壁画出行仪仗图中出现骨朵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宋代上自帝王,下至士庶,仪仗中皆有骨朵,并且有明确的规定,“凡皇仪司随驾人数,崇政殿只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二人,执擎骨朵,充警卫”<sup>[29]</sup>。从骨朵在契丹仪仗中的出现频率来看,辽代和北宋都将骨朵作为仪仗的必需品。关于骨朵的来源和作用已有学者进行考证<sup>[30]</sup>,其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棍棒头发展而来,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兵器,到了五代和辽这一时期引入到仪仗之中。在仪仗中,侍卫手执骨朵和杖骨朵既有给人警示的作用,又可作为兵器保护主人。杖和骨朵有着相似的作用,库仑 M6、M7 出行仪仗图中均有侍卫双手擎杖,神态威严地站立于仪仗队伍中。因此骨朵和杖应是辽代契丹仪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2、伞。伞在契丹墓壁画仪仗图中也较为常见。伞有的作折起收拢状,由专人负责执掌,一人肩扛一伞,如萧和墓,库仑 M6、M7、M8 和床金沟 M5 等。在一些表示行进的出行仪仗中,伞作打开状,如萧义墓和滴水壶墓等。由萧义墓和李唐《文姬归汉图》第十四、十五、十六页所见,行进中打伞之人均步行跟随于主人的车或坐骑旁。可以想象,打开的伞并不能完全为主人遮风挡雨,因此伞在仪仗队伍中就成为了专门显示主人身份的象征物。伞是辽代仪仗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在目前所见辽代契丹墓壁画仪仗图中伞的出现率是最高的,其形制也基本相同。

3、水罐。在萧和墓和滴水壶墓出行仪仗图中绘有水罐,一人在胸部一侧手持链的一端,另一端从颈部绕过至腿部系挂一罐。北宋规定,“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sup>[31]</sup>,由此条可知北宋的普通民众在出行时是不能乘坐檐子,也不能使用银骨朵和水罐作为仪仗用具,据此推测宋代官僚阶层出行是可以携带水罐的。辽地草原地广人稀,契丹人在外活动时需要携带水罐以供主人口渴时所用,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 M3 墓道东壁出猎图中绘一人提盒,一人提水罐,一人背弓箭,一人引马,西壁绘打猎归来时的驼车和随从<sup>[32]</sup>,此场景应是真实反映契丹族人,“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转徙随时,车马为家”<sup>[33]</sup>的场景。萧和墓和滴水壶墓壁画中所见水罐和北三家 M3 壁画所绘的水罐很接近,正是契丹人这一习俗的反应。久而久之,水罐既是主人出行的必需品,同时也成为仪仗的组成部分。北宋对于出行仪仗中水罐使用的限定可能是受契丹人的这一习俗所致,引水罐出行也逐渐成为宋代上层人物的时尚,这是宋辽之间互相交流的又一例证。

4、坐具。在出行仪仗图中绘有坐具的墓葬有萧和墓,库仑 M1、M8 和滴水壶墓。萧和墓所绘座椅的座部似可折叠,与李唐《文姬归汉图》第十四、十六页所见的座椅相同。其它三墓所绘的座椅大致相似,均为平座靠背式。此坐具应是主人在野外时为主人提供休息所用。从传世的胡瓌《契丹人骑马出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片旷野中主人坐在座椅上,四周是侍卫、侍从以及马匹<sup>[34]</sup>。坐具和水罐是和契丹人生活在地旷人稀的草原以及旅途遥远的游牧生活相适应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仪仗用具,它们在出行中携带属于实用具但兼有仪仗之用。另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记载,“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由此可以知,辽代皇帝或贵族在狩猎时也有以鼓为坐的可能,这可能是由于出猎时的戎马生活不便携带坐具,因此便就简以鼓为坐,而以仪仗用鼓中的大鼓充当贵族主人的坐具也不是没有可能。

5、长剑。在萧和墓,库仑 M1 和 M8 所绘出行仪仗队伍中有专门的侍从每人肩扛一柄长剑,均有剑鞘。萧和墓和库仑 M1 在剑柄上挂有流苏,库仑 M8 剑首饰云纹,剑鞘上有细带环绕。剑作为搏杀兵器在汉代以前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自魏晋南北朝以后,钢刀逐步取代了剑的地位,至宋代已基本不在军队配备作为实战武器的剑<sup>[35]</sup>。因此剑在仪仗队伍中应为专用的仪仗用具,这一特点在李唐《文姬归汉图》第十四、十六页中体现无疑,

而且该画中的长剑和契丹墓出行仪仗图所绘长剑形制相仿,可能辽代的仪仗用剑有其固定的规格。目前所见凡绘有扛剑仪仗的墓葬墓主人身份均较高,因此剑是目前所见辽代契丹仪仗中最明显的大贵族身份象征物之一。

## 二、壁画仪仗图内容组合的探讨

目前所见绘有出行仪仗图的辽代契丹人墓葬,床金沟 M5 的年代在辽代中期以前<sup>[36]</sup>,其余都属辽代中后期,这一现象可能和辽圣宗 1004 年和北宋签订“澶渊之盟”有关。从此时起,和平的政治环境使契丹民族更多地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开始了更加深刻的封建化过程。辽代中后期墓葬中出行仪仗图壁画的增多在契丹上层人物中的反映更为明显,通过对辽代契丹墓壁画仪仗图内容的统计可以发现,壁画内容、人员组成、人员数量和墓室(主室)大小有着一定的联系。按照表一中所列,大致可以将这些高等级人物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代表墓葬有萧义墓,萧和墓和库仑 M1。这些墓葬的墓室长宽在 5—6.3 米左右,长剑以及配套的旗鼓均在这一等级的墓葬中绘制,其它用具各墓情况略有差别,出行图队伍总人数都在 20 人以上,最多者如库仑 M1 达到 51 人。库仑 M8 和鸽子洞墓已被破坏,出行图不能反映仪仗的原貌,但是根据墓葬的规格来看,这两者应当是具备了出行仪仗中所必备的物品以及人员。从这几座墓葬墓主人的身份来看,萧义为北府宰相,萧和夫人下葬时已贵为晋国王妃,鸽子洞墓主人为萧氏显贵,库仑 M1 和 M8 为萧孝忠家族的显贵,因此他们可以用旗鼓用来显示身份。据简报推测床金沟 M5 的墓主人可能是皇室成员<sup>[37]</sup>,但该墓没有在壁画中绘制旗鼓和长剑等用具,这可能和床金沟 M5 年代较早有关。辽代早期仪仗制度和墓葬等级制度的结合可能并不紧密,但就床金沟 M5 所绘的出行仪仗图来说已经要比中前期不具备仪仗图的宝山 M1、M2,耶律羽之墓,驸马墓和陈国公主墓要丰富的多。

第二等级,代表墓葬有库仑 M2、M6、M7。这些墓葬墓室长宽在 4.5—5.5 米左右,其墓室规模与第一等级差别不大,但出行图队伍总人数在 10—20 人左右。这些墓葬的仪仗图中具备了伞、骨朵、杖等物品,没有第一等级所特有的长剑。这三座墓葬应是库仑墓群中级别较低者,其代表的应该是一般的契丹贵族成员。

第三等级,代表墓葬有滴水壶墓,解放营子墓。虽然这两座墓葬壁画中出行图队伍人数也在 10 左右,但是墓室长宽均在 3—4 米左右,要小于第二等级的墓葬。从仪仗图内容整体来看,仪仗用具具有坐具、伞、骨朵、水罐等,有旗无鼓。它们的仪仗排场的威仪要逊色于第一和第二等级,排列也没有像第一、第二等级那样有序,墓主人可能是一般的契丹官员。

表一 壁画仪仗图用具及墓葬规格统计表

墓葬地点	墓葬规格		仪仗用具						
	主室(米)		长剑	坐具	旗	鼓	伞	杖/骨朵	水罐
	长	宽							
萧义墓	5.82	5.82			?	5	2?	2?	
萧和墓	6.1	6.4	3	1	?	5	2	4	1
库仑 M1	5	5.22	1	1	5	5		11?	
床金沟 M5	5.3	5.3					1	3	

鸽子洞墓	6.3	6.1			5	3?		1?	
库仑 M8	5.64	残	4	1	5	1?	2	2?	
库仑 M2	5	5			1			3	
库仑 M6	5.4	5.5					2	3	
库仑 M7	4.64	4.72					2	4	
解放营子墓	4.1	4.1			4			1	
滴水壶墓	3.3	3.3		1			1		1

(说明: 上表统计中有问号者皆为壁画部分保存下来者, 真实情况可能要多于上述统计。)

通过上述分析, 大致可以发现辽代契丹人墓葬的壁画仪仗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身份。庆陵东陵的墓道壁画也发现了仪仗图, 有汉装和契丹装束的官员以及手执骨朵的侍卫等。东陵墓道并未全部揭露, 具体内容不详, 但是就其级别来说显然是辽代贵族中最高的, 其次是享有旗鼓的贵族, 再次是一般的贵族, 最后是契丹官员, 普通契丹人中没有仪仗。

庆陵的东陵前室东西两侧分别站立契丹装束和汉人装束的官员。萧和墓墓道南壁仪仗图中的人员皆为汉人装束, 北壁仪仗图中的人员皆为契丹装束。从库仑 M8 残留的仪仗图来看, 其南北两壁仪仗图也存在着如同萧和墓仪仗图中人员装束上的差异。李唐《文姬归汉图》第十四页所绘仪仗中, 主人前方是汉装的仪仗人员, 后方是负责车骑和五色旗的契丹人。另外, 在萧和墓, 萧义墓, 鸽子洞墓的出行仪仗图中, 负责旗鼓的皆为契丹装束的人员。库仑 M1 仪仗图中汉装人员和契丹装人员相混杂, 但绘于旗鼓旁的是五名汉装人员, 林沅先生认为这五人可能是辽代专门执掌旗鼓的官员——“旗鼓拽刺”, 而且不排除他们是身着汉装的契丹人的可能<sup>[38]</sup>。虽不能将衣装和民族完全等同起来, 但是通过墓葬壁画的表现形式, 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辽代契丹贵族仪仗是融合了汉族和契丹族的二元仪仗。

《辽史》中关于辽代仪仗的记载较为复杂, 有国杖、汉杖和渤海杖之分<sup>[39]</sup>, 但就其所记载的内容而言难以进行逐一考证, 而通过对辽代契丹人墓葬壁画中出行仪仗图的分析, 我们对辽代契丹人的仪仗有了一些认识: 辽代契丹人的仪仗制度主要是从中原王朝吸收而来, 其中有两吸收的高潮, 第一次是辽太宗灭后晋之后对中原汉仪的吸收, 但却尚未形成定形的仪仗等级制度, 其表现是在辽代早期契丹人墓葬中缺乏仪仗图的壁画内容。第二次是在辽圣宗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后, 两国之间保持了长期和平状态, 这不仅为辽代吸收汉文化提供相当有利的条件, 而且还使辽代贵族有了闲暇之心去享受奢侈的生活, 铺张的仪仗排场逐渐流行起来, 因此辽代中期以后契丹人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出行仪仗图题材的壁画, 不同等级有不同的内容规定, 但是并不十分严格。这套仪仗制度是模仿中原仪仗而形成的, 但是在吸收过程中也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一些特有习俗。

#### 参考文献

- [1] a. 田广林. 契丹舆仗研究[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 544~555. b. 郑深明. 关于辽墓“出行图”的考证[J]. 华夏考古, 2004, (4): 97~104.
- [2] 田村实造, 小林行雄. 庆陵(日文)[M]. 东京: 座右宝刊行会, 1952~1953.
- [3] 王健群, 陈相伟. 库仑辽代壁画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年.
- [4] 哲里木盟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库仑旗第五、六号辽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 总第2期, 35~46, 28.

-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哲里木盟博物馆. 内蒙古库仑旗七、八号辽墓[J]. 文物, 1987, (7): 74~84.
- [6] 温丽和. 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J]. 考古, 1989, (4): 324~330.
-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05, (1): 33~50.
- [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631~638.
-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林右旗床金沟5号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2, (3): 51~64.
- [10] 巴林左旗博物馆.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J]. 考古, 1999, (8): 53~59.
- [11] a. 项春松. 辽宁昭乌达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 文物, 1979, (6): 22~32. b. 项春松. 辽代壁画选[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2, 图二, 12, 图十七.
- [12] 辽史[M], 仪卫志四.
- [13] 辽史[M], 礼志一.
- [14] 辽史[M], 仪卫志四.
- [15] 林沅. 辽墓壁画研究两则[A]. 林沅学术文集[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424~431.
- [16] 邵国田. 辽代鹰军考——兼述教汉旗发现的“鹰军图”[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3): 39~47.
- [17] 名画经典·李唐·文姬归汉图[Z].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98. 后文中出现此画的内容均引自该画.
- [18] 田广林. 契丹髻发礼俗述略[J]. 北方文物, 1998, (4): 38~43.
- [19] 同[7].
- [20] 同[8].
- [21] 辽史[M]. 卷八十一, 萧孝忠传.
- [22] 同[5].
- [23] 万雄飞. 辽秦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考[J]. 文物, 2005, (1) 88~96.
- [24] 同[23].
- [25] 辽代墓葬壁画的散乐图内容发现较多, 如宣化辽墓群各个墓葬, 羊山M1, 解放营子墓等多处墓葬中均有散乐图内容的壁画.
- [26] 辽史[M], 乐志. 中华书局, 1974: 891.
- [27] 邵国田. 教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9, (1): 90, 图一, 1, 封面彩版.
- [28] 彭善国. 辽墓鹰猎题材壁画及相关文物初识[A]. 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29~236.
- [29] 宋史[M], 仪卫二, 行幸仪卫.
- [30] 陆思贤. 释“骨朵”[J]. 考古与文物, 1982, (5): 98~101. 梁淑晶. “骨朵”释析[J]. 辽海文物学刊, 1989, (1): 254~261.
- [31] 宋史[M], 舆服五, 士庶人服.
- [32] 教汉旗文物管理所. 内蒙古昭乌达盟教汉旗北三家辽墓[J]. 考古, 1984, (11): 1008, 图七, 1009, 图八.
- [33] 辽史[M]. 营卫志中.
- [34] 胡瓌. 契丹人骑马出猎图[Z]. 转引自[2].
- [35] 杨泓. 中国古兵器论丛[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15~130.
- [36] 简报从该墓壁画中契丹人髻发的形象推测墓葬年代为辽代中期偏早, 最晚到辽圣宗统和以前, 笔者赞同这一认识.
- [37] 同[9].
- [38] 同[15].
- [39] 辽史[M], 仪卫志四.

## The Guards Painting on the Murals of the Qidan Tom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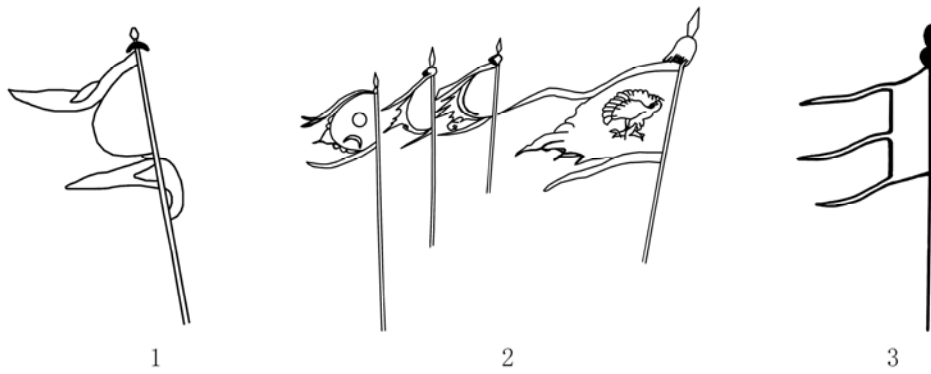
WU 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tomb murals about The Guards, when the masters going outside of Liao Dynasty, are well-know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me principal appliances of these murals about The Guards, we can find that the Qidan people absorbed the Han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o Dynasty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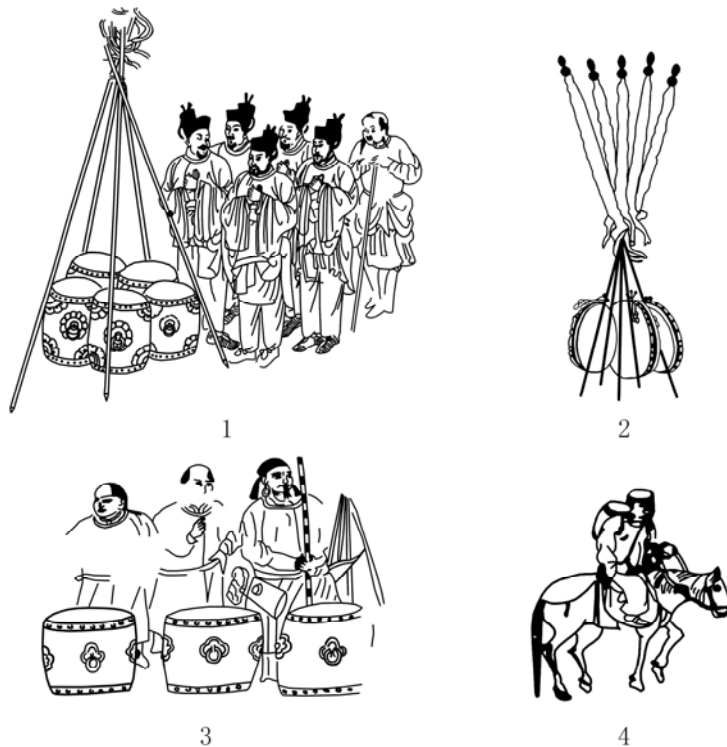
Central Dynastie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and later period of Liao Dynasty, this kind of murals usually appeared in the tombs of nobleme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ntent of these murals were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of the owners of these tombs when they were alive.

**Key words:** Qidan tombs; Liao Dynasty ; Tomb Murals



图一 辽代仪仗用旗局部图

- 1、解放营子墓八角形木椁东壁壁画仪仗用旗局部
- 2、敖汉旗博物馆征集辽代木棺右侧的“军旗图”局部
- 3、李唐《文姬归汉图》第十五页仪仗用旗局部



图二 辽代仪仗用鼓局部图

- 1、库仑 M1 墓道北壁出行图局部——旗鼓及旗鼓拽刺
- 2、李唐《文姬归汉图》第七页所绘旗鼓
- 3、鸽子洞墓墓道北壁出行图局部——旗鼓及其后站立者
- 4、萧和墓墓道北壁契丹人出行图局部——背鼓骑手之一

---

**收稿日期:** 2005-06-10

**作者简介:** 吴敬, 男, 浙江兰溪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